

# 贵州少数民族 文学艺术研究

吴红梅◎主编

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丛书 韦煜 / 主编

GUIZHOU SHAOSHU MINZU  
WENXUE YISHU YANJIU

# 贵州少数民族 文学艺术研究

主 编：吴红梅

副主编：商韵 董宝平

GUIZHOU SHAOSHU MINZU  
WENXUE YISHU YANJIU

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丛书 韦煜 / 主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吴红梅主编.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12  
(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680-3644-3

I. ①贵… II. ①吴…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贵州 IV. ①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3875 号

贵州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

吴红梅 主编

Guizhou Shaoshu Minzu Wenxue Yishu Yanjiu

策划编辑:牧心

责任编辑:章红

装帧设计:孙雅丽

责任校对:封力焯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电话:(027)81321913

邮编:430223

录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2.75 插页:1

字数:322千字

版次:201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52.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民族理论研究

#### 我们如何面对历史

——当代民族研究的核心问题 纳日碧力戈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培育研究综述 李 静 施晓瑞 /9

#### 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打造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汪小丽 /18

#### 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遗产保护

——苗族史诗《亚鲁王》田野调查札记 吴正彪 /24

#### 民族志田野调查的视角态度

——以《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为例

杨培德 /37

#### 脱域与嵌入:另类的多点民族志

——关于一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反思 张晓红 胡鸿保 /41

### 民族文学研究

#### 仪式大词:口头传统与仪式叙事关系探析

——以纳西族“哲作”(tʂer<sup>55</sup> dzo<sup>31</sup>)为个案 杨杰宏 /51

#### 口头叙事与文献叙事的互证

——论《张秀眉起义史诗》的史料价值 吴一文 /63

#### 侗台语民族祈雨仪式的口头叙事隐喻

——以壮族史诗《布伯》与泰国神话《青蛙神的故事》的比较为例

李斯颖 /71

论苗族古歌的对比叙事 兄弟的隐喻 ——中国西南地区同源共祖神话探讨	吴一文 /79
从蚕马神话到盘瓠神话的演变	高 健 /88
论水族民间文学的分类	吴晓东 /95
论莫友芝散文的地域特征	石尚彬 /101
过山瑶史诗《盘王大歌》研究述评	李朝阳 /107
论贵州苗族老虎故事的结构	胡铁强 何雅如 李生柱 /113
“苗族杨姓不吃心”故事的演变与习俗的起源	张钧波 /121
	吴晓东 /127

## 民族艺术研究

挖掘黔南民间工艺 传承本土民族文化	杨 坤 /139
贵州民间美术色彩初识	丁文涛 丁 川 /145
布依族枫香印染技艺及其纹样造型的意蕴探源	
	王科本 /151
黔南苗族银饰的美学特点及文化特性	田爱华 /155
贵州毛南族妇女服饰的流变	孟兴华 刘世彬 /160
水族豆浆染的文化价值及传承现状浅议	潘 瑶 /165
布依族舞蹈——“雯当姆”的艺术与审美特征	樊 敏 /169
论水族曲艺“旭早”的源起及嬗变	石尚彬 商 韵 /174
“旭早”与水家人的社会生活 ——水族音乐系列研究之“旭早”	李继昌 /183
苗族芦笙文化的交流与影响	文 毅 冯 耘 覃亚双 /190
贵州龙里巫山岩画人物头饰艺术	牟孝梅 张丽娜 /194



民族  
理论  
研究





## 我们如何面对历史 ——当代民族研究的核心问题

纳日碧力戈

历史对中国非常重要，对民族研究非常重要。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研究民族问题，从过去看现在，都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回忆。我们目前的争论往往都是围绕要不要历史、如何看历史。我们知道：2014年9月28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其核心主题就是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65年来，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是正确的；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特色道路是正确的；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民族工作是成功的。强调这样的观点，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市场经济下，民主的水平在提高，大众的公民意识在提高，我们面临一些尖锐的、绕不过去的问题：公民和民族哪个重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说我们有了公民的身份以后，民族的身份就不再重要了？它们是平行的关系呢，还是从属性关系？这是一个焦点。有些学者往往不看历史，平面地看问题：我们一块儿长大的，凭什么你就可以照顾多少民族分，可以多生几个孩子？都是公民，怎么不平等了呢？我们国家允许不同观点充分发展，没有直接干预。比如说贵州大学的一个校友叶小文先生来贵大演讲时，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北大一个教授提出：我们的民族工作是失败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有问题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叶先生没有直接回答，他说：“这个是学术问题，我不便表态。”可见当时我们国家很宽容。可是后来学者的观点开始比较尖锐对立，有一些学者提出来：要肯定过去的民族政策，要讲民族团结，不是销毁民族，不是同化，而是坚持过去的正确的道路；民族区域自治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如何改善，民族区域自治一定要实行。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一个基本政治制度，这是不可动摇、不能怀疑、不能挑战的。我们到贵州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民族是很团结的；到了内蒙古可以看到：民族也是很团结的；新疆有些问题，那是少数人的问题，不是多数人的问题，西藏也是这样。民族不是隐患，不是累赘，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我们的资源。费孝通教授生前讲过一句话：让遗产变成资源。遗产是死的，变成资源它就变成活的了，要让它活起来，要善用、



会用、智慧地使用我们民族的资源。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纠正和杜绝歧视及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我们国家这个方面的教育已经做了很多年，有很大成就，但是还不够，还要继续深入。这个提法有一个深远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国民党，甚至追溯到孙中山时代，那个时候就是把各个少数民族同化为汉族，建立所谓真正的同化民族，把少数民族跟汉族等同起来，把中国跟汉族等同起来。这肯定是走不通的，历史也证明走不通。中国共产党走了另一条路：承认少数民族，让少数民族自觉、自治，才有现在少数民族自治制度，让各少数民族和睦共生，互利团结。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败。什么原因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少数民族政策不一样，少数民族起了很大作用，有了重大贡献。比如说内蒙古自治区于1947年成立，比新中国成立还要早两年。原因是内蒙古的少数民族加入共产党，还有一些民族主义的活动家，也加入共产党，原来的地方内部人民革命党，也加入了共产党，这对共产党的事业贡献是巨大的。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尊重差异过去提得较少。生态的说法是：包容多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把自然科学、环境科学的生态概念用到人身上，用到社会、用到自然、用到万象共生这样一个大场景里面。“现代”是唯一的出路，没有生态，什么都没有。所以生态是一个大的回归。回到什么时代呢？回到“地天通”的时代。在《尚书》中有一个故事：过去天和地合同的，神可以下凡，人可以上天，那个时代“民神混杂”。但是第五个皇帝颡项不高兴，派了两个大臣“重”和“黎”，他们把那条路给阻断了。“绝地通天”，不让人神混杂，人不可以随便上天，神不可以随便下凡，所以就出来了中间的官僚制度。官僚把着这条路，你要买通他，他才让你上来，让你下去。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要回到“绝地通天”的时代，但是是一个更高阶段的回归：要“地天通”，让人和神混杂在一起，要承认有神、有人、有天、也有地，它们是有差异的，要尊重差异，这很重要。而且还要守望相助，最典型的意思就是邻居之间，你那儿进小偷了，我帮忙看着，把小偷逮着，或者是赶走了；过两天我这儿进小偷，你也帮忙；我这没饭吃，你帮我，同样，我也帮你，这就叫守望相助。天和地之间要守望相助，各民族之间要守望相助，不是一个吃掉一个，而是互相帮助，互相维持。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用法律保护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四个认同：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多民族是特色，是有利因素。这就回答了前面的说法，少数民族不是累赘，更不是隐患，它们是一笔财富。比如像北京、上海这样一些大城市，有雾霾了，可以到贵州来洗肺；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下一代不尊重上一辈的问题，出现了道德滑坡的问题，也可以来我们黔南这样民风淳朴的少数民族地区来“洗肺”。所以，我们要珍惜、爱惜、善用这些资源。有一次同济大学有一个教授，来到喀什，说他们在文化援疆。我问他：“你是不是觉得上海的文化比新疆的文化高明？你看到那些新疆的穆斯林尊老爱幼、路不拾遗的民风了吗？”这些地方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尊老爱幼，有自己的一套做事、做人的方式方法，有一套规则和道德标准，这些东西一点也不输给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所以应该是科技援疆，而文化援疆的说法就不太贴切了，应该说是互相学习。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各民族共同开发河山疆域，共同创造历史。所以过去西方传来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概念，是行不通的；孙中山先生“把大家都同化成汉族，建

立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新中国强调：这块土地，这块河山，这块疆域，是各个民族一块儿开发、建设，共同创造了这个历史，不是哪一个民族单独地创造历史、开发这块土地的。所以“多元一体”这个说法又被提了出来。“多元一体”最早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还借用了孔子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结论是：中华民族是大家庭，各民族是家庭成员。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家庭成员就是兄弟姐妹，中国人喜欢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等，大家庭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而不是只有一个。

## 二

第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我们中国民族关系的学术思考和具体政策进入了一个特定的阶段。它的一个核心是费孝通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在抗战时期的争论：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构成的还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另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历史？要不要承认历史？是平面地看还是要纵向地看？是牢记历史，发掘历史记忆，还是忘掉历史？平面地看：从现在起，我们都是公民，所有的差异都消灭掉，我们都平等。能做到吗？问题都出在这儿了。过去的中国可以说是多民族交互性的历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纵向的先后交互治理，少数民族也入土中原；也有横向的交互关联，从家族到个人都有顶针序跋式的家族相似性。家族相似性就是少数民族治理，虽有差异，但也大同小异，都有从上而下的一套治理方式。

第二个基本判断：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现在占据上风，就是同文同族的诉求，被复活成为同文同国的同化主义。对于差异的追求和恐惧也投射到对少数民族的热爱和恐惧之上。有的人热爱少数民族，去了一趟西藏就感动得不得了，有的干脆就当了尼姑、和尚，不回来了；有的惶恐、担心，这么多人，吃的不一样，穿的不一样，说话不一样，这怎么办？所以感到恐惧。过去没有这样的恐惧，因为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交通，很少来往，大家也不太了解少数民族；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大家开始广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也广泛进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些人接触少数民族以后就发现：这些人跟我们怎么不一样？他们到底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呢？我到现在都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计算机的姓名输入模式只有三个字，要是汉族的双姓，四个字，肯定要删除一个；要是少数民族姓名有五个字，就会删除两个，没有全名。所以就会有一个容易被人家误解的少数民族问题：连姓名权都不能保证。我在复旦大学有一个口号：“人类学”普及之日，就是国民素质提高之时！“人类学”在国外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我国在1924年才从德国引入了“民族学”这个概念。民国时期有一定发展，主要是做辩证研究，也是做同化少数民族的工作。新中国成立，有一段时期实行过试点研究，后来也取消了。1979年，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才得到恢复。所以说，走到今天不容易。但我们的人类学、民族学没有进入国民素质的教育当中，这很遗憾。少数民族也好，多数民族也好，一定要有一个共同认同的基础，要不然就会顺从“丛林法则”，谁的基数大谁管用，那就变成动物世界了。我族中心主义会导致他族中心主义，形成水涨船高的竞争，其中就包括资源竞争，把资源竞争民族化；也包括符号竞争，例如蚩尤和黄帝打起来了，成吉思汗和岳飞打起来了，这就麻烦了。所以这方面的竞争得避免。

在全球信息流通的情况下，现实生活中存在民族关系的紧张，但社会人群（包括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并没有放弃和谐共生的愿景，他们还是希望团结共生，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希望。中国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政治协商，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的政治协商，不是多数民族赐给少数民族一个区域自治，不是多数民族赐给了少数民族一个优惠政策，恰恰相反，它是互相妥协、互相照顾、互相让步的结果。民族团结不是民族同化，而是互相帮助。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三项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和谐共生是一种生态关系，要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民族遗产，每一个民族发展到今天都不容易。

李克强指出：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改革创新。过去是团结上进，现在要团结各个阶层，尤其是群众。创新的“地天通”就是生态，生态中国。要吸取历史的经验，而且要正确地吸取历史经验，不走旧中国同化少数民族的道路。中国应该做文化大国、包容大国，要有一个大国气度，要珍惜自己的文化。某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它怎么走，要多听听本民族人的意愿，多听听当地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意见。

### 三

“守望相助，和睦共生”是一个话题，也是一个生态的话题。去年初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相助”的概念意义重大：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民族团结的基础，也可以高度概括为“守望相助”。无论哪个民族的同胞都热爱自己的历史文化：守望优秀遗产，守望故里家园，守望祖国山河，子子孙孙互相欣赏、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为环境，互守尊严，共同生存，各个民族应该这样“和睦共生”，这是“守望相助”的核心所在。回顾历史，毛泽东说过：少数民族最大的贡献是在政治上承认中华民族。少数民族地区宝贝多。蒙绥问题的一扇门是蒙人欢迎汉人进去，开发白云鄂博铁矿，建设包头钢铁企业；另一扇门是汉人支持把绥远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内蒙古统一自治。这是不是协商，是不是互让？因为当时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绥远不加入你们内蒙古，我们加入山西，加入河北。后来做了工作，加入了内蒙古。原来那也是内蒙古的一块地，后来给分出去了，现在又回来了。回顾历史，签订西藏十七条协议时，毛泽东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我们是一家人了，家里的事，商量着办就能办好。他还对西藏上层领导人士说过：你们西藏在新中国大家庭中是有很大资本的，要不然我们的国界就到四川省的边上了。我们要多讲讲这样的历史，讲讲这样的故事，就会对少数民族心存感激了，而不至于把它看成累赘，看成潜在的威胁、隐患。

少数民族的国民主体性，可以用席慕蓉的诗句“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来形象地表达这种爱国主义的基本情怀。爱国主义不是喊口号，是从热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开始的。爱国一定是从爱父母、爱子女、爱民族、爱国家层层递进的，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不是冲突的。少数民族爱自己的民族，往上就是爱自己的国家，所以爱民族和爱国家不是互相对立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祖先智慧的宝库，是国民属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定它就是否定少数民族的国民身份。

“彝海结盟，世纪诺言”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刘伯承打凉山的时候，果基小叶丹拦道。后来他们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刘伯承举起瓷盅，大声发誓：“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同果基小叶丹在彝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将酒一干而尽。

果基小叶丹也端起瓷盅说：“我小叶丹同刘司令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不守约，同这鸡一样地死去。”也喝干了酒。当着众人，刘伯承送果基小叶丹一支左轮枪，小叶丹也送给刘伯承一匹黑骡子。这就是传诵至今的“彝海结盟”的佳话。这样的仪式：喝酒，互相送礼，今天各个民族之间、民族内部都有这样成事的。没有人是喊着“我们团结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口号把事情办成的。

我们可以用奥地利的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关于绳索的隐喻来说明多民族的“多元一体”。绳索从头到尾不是一股而是多股交叉在一起，多股重叠交叉，互相紧紧交织在一起，最终拧成一股绳。拧在一起的绳子和绳子并不一样，但是拧成一股绳后就变成一个统一体。他提出“家族相似性”的重要概念。我们看一二三和二三四，中间有两个要素是相同的；二三四和三四五有两个是相同的；但是一二三和四五六就没关系了。中国的民族关系就是这样的：远的民族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但是近的民族互相通婚，相互之间有关系。西北地区有蒙回（蒙古族信回教）、藏回、汉回，反过来也有好多人当了蒙古族的。所以看一部分是像的，另一部分不大像，再走远一点就没关系了，可是邻居是像的，越来越像，越来越像……这就是家族相似性。用这样的关系来比喻中国的民族可能比较恰当。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统一体，各民族有点像，又有点不像，但都是兄弟关系。以蒙古语为例：蒙古语在翻译“中华民族”时，都用复数，没有单数。蒙古语的“中华民族”的直译是：中间的很多根，就是中根千枝的意思。所以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解释呢？如果把它看成国家，当然是一个；如果把它看成民族，它就是多个。在蒙古语、维吾尔语等等语言中都有证据：中华民族是多个。所以，得到的启示就是：尊重差异，守望尊严，和而不同。在“彝海结盟”时，汉彝双方都不愿意吃掉对方，或者把对方同化掉，把对方变成自己，相反，双方根据相互间的差异或者特殊性，以结拜或者交换的方式获取对方的信任和支持。既守望了自己的传统，又互相守望，互相帮助。民族关系何尝不是如此？通过交换信任、友谊、生命，成为兄弟姐妹，达成重建共识，建设同舟共济的家与国。先有家，后有国，或者家是基础，国是升华。我们过去总是把两者对立起来：先有国后有家或先有家后有国。实际上家是基础，国是它的提升，不能完全对立起来。历史和民族制告诉我们：民族和睦共生，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互相帮助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互守家园、互守尊严、荣辱与共之上。再扩展一些：如果我们能够与自然山水、与动物植物、与万物万象和睦共存，在民族和族群之间，四海之内，互为环境，民族和睦共生就不再是梦想，而是真切的现实。尊重他人、尊重他族、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尊重家人。世间万物互为环境，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国家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李红杰有一篇文章题目非常好：《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是尊严》。中国，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它一定不能来自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不会只是一个，民族主义一定是多个，一定会多于56个，还会更多。所以不能来自民族主义，更不能来自弱肉强食的单向同化。如何从各民族的传统智慧中发现重叠故事？如何从多语表达中发现身份共享？如何从先祖训言中发现万物共生？这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需要进行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发掘我们祖先智慧，发掘怎么用生态办法解决和大自然、和其他民族、和社会的各种关系。

我们一定要学会：生活在同一个国度，守望同一个家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繁荣。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正向思考和最大的正能量。我们需要学会“美人之美”，学会主动地说“你的民族很智慧”，而不是说“你的民族很落后，我们帮帮你”。你对别人说

“你的民族很优秀，你的民族很智慧”，别人也会回答“你的民族也很优秀，你的民族也很智慧”，甚至会说“你的民族更优秀，你的民族更智慧”，这样互相肯定要比互相贬低好多了。“你的民族不行，你的民族落后”，或者说“你的民族只是能歌善舞，脑子不够用不聪明”，这就很麻烦。我们不能怀有旧时代的殖民心态，把别人的语言说成是鸟语，把自己的语言说成是天籁之音；把别人的文化说成是落后，把自己的文化说成是先进；把别人的信仰说成是迷信糟粕，把自己的信仰说成是优秀传统文化。这样是不行的，对他人的文化、他人的信仰也得学会尊重。

“守望相助，互守尊严”，可以启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新思维。历史和现实无可辩驳地表明：民族团结不能靠一厢情愿，不能靠一头热，不能靠自己用自己的语言给他人开菜单，而是要各民族主体参与，靠各民族主体语言共同发声拨动心灵之弦，靠各民族之间互为环境、守望相助；靠各民族尊重历史传统和自然山川，友好互助，共建和谐家园，这才是各民族和睦共生之道。

（原载于《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培育研究综述

李 静 施晓瑞

习近平于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将“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归纳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内容之一。<sup>[1]</sup>“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体现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维，开辟了中国民族研究的新境界，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培育的研究也随之兴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有助于使不同民族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认同要素，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归属感与依附感。系统研究这项议题，对各民族的认同与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相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颇具价值，但缺乏整体理论深度，并不全面和系统，往往只是针对汉文化或儒家文化的。这是由于关于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学者们的意见本就是不统一的，在很大程度上以主流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以多数民族为中华民族的意识占据了一些人的头脑，使得许多相关研究在出发点上就有失偏颇。总的来说，这些成果有助于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学术旨趣，但未见系统地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和现状调查研究，这一方兴未艾的研究内涵有待进一步开拓。为此，有必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培育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寻找存在于其中的问题，以便于更好地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问题研究

取得成果最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方向之一是历史研究，通过对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天下观、民族观及民族政策实践、民族关系的研究来探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源、形成原因、发展和流变。

高翠莲对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意识与国族主义进行了研讨，认为他在“五族共和”理论和民国初年国人民族意识的互动中形成了清晰的中华民族意识和共同体的一体意识，虽然存在模糊国族与民族界限等局限，却顺应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需要，体现了国族构建的本质。<sup>[2]</sup>

同时，她对中华民族自觉的最初形态也有着墨，认为它自中日甲午战争后产生，其最

初形态是“种族”自觉。<sup>[3]</sup>此后，精英尝试用民族自觉代替种族自觉，这种研究导致了民族认同分化的现象。接着学者们通过反思和认识确立了中华民族一体自觉。这一发展进程显现了独具一格的中华民族结构和中华民族一体认同发展趋势的时代性和历史性。类似观点还有：何博认为抗战时期“民族之敌”的出现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调适迎来国家认同高涨和中华民族觉醒；石培玲认为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观念的成熟；钟天娥认为20世纪30年代严重的民族分裂危机促使知识分子的“国家领土主权意识”、“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得到空前觉醒；石碧球认为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彭南生认为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纪元；曾凡远、姜爱敏认为“中华民族”的生成和确认与近代保种保国的情境密不可分。

俞祖华认为中国近代融合于世界的历程是中华民族、国家、文化逐步认清“自我形象”并将之清晰呈现于世界的过程：即在“血缘或种族身份”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近代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文化认同意识深刻地渗透着中华一体思想的影响，这三种认同间相互影响、借鉴和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提升与加强。<sup>[4]</sup>

李宪堂通过研究中华民族天下观的逻辑起点和历史生成，认为天下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世界观，以“天道”和“天命”的形式显现世界的意义，集中体现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认知偏好和思想意识。它为中华民族思想和实践供给了一个预设性的认知框架，天下观生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实践深化与展开的过程。<sup>[5]</sup>

关键英认为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夷夏之辨对民族融合并无阻碍作用，反之还对民族融合浪潮推波助澜，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变得越来越明晰。

胡芮对近代中华民族形态嬗变的思想史进行考察，认为中国民族尽管在历史上称谓各异，但“民族”作为一个重要概念维系着数千年的历史叙事。在试图打造中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概念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思想界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具有国族意义的概念。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被建构的意识形态，与传统“民族”概念存在着从“道德想象共同体”到“伦理实体”的嬗变轨迹，所以传统“民族”概念本身的道德意蕴应该重新加以重视，同时“中华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现实形态，在理想国家哲学层面意义上的建构也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之中。<sup>[6]</sup>

杨文炯认为现代的中华民族正是在历史上各民族长期在地缘、经济、族群、政治、文化五大基础上相互交流交融发展而来，形成了相得益彰的多元文化与一元认同的共生共享的多元一体结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在国家认同的熔铸中，中华民族这一命运共同体从民族自在走向了民族自觉。传统文化的显性结构是在1840年西方入侵前已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即现有的56个民族；隐性结构是文化价值体系的“一室四间”结构，也就是以儒教为中轴线，结合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共组的“四教合一”形态。<sup>[7]</sup>

乌凤琴、司徒才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研究蚩尤与牛河梁红山文化的联系，认为黄帝部落联盟与蚩尤部落联盟的对峙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第一次冲突和融合，从不同角度印证了中华民族同根共祖，是统一不可分的整体。

刘宾研究了古代中原人的西域观念，他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始于穴居草莽的传

说时代, 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初形态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已出现。先秦起, 西域与中原已有往来, 产生了最初的认同意识, 这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结构因子。<sup>[8]</sup>

冯育林、邱明红在民族政治学视域下研究中华民族思想及其历史演变, 认为它与变化中的“中华民族”概念界定密切联系。中华民族思想的每一次大的发展与变化, 基本都是关于中华民族的大讨论, 可以把中华民族思想的历史演变总结为一个缘起—发展—集结的过程。<sup>[9]</sup>

综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问题研究成果, 大多数研究都选择近代时期作为研究的基本时间点, 尤其注重对民国时期的研究。这是由于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华民族开始产生自觉意识, 并形成了清晰的中华民族意识和共同体的一体意识。另外, 许多学者也着眼于中华民族思想史的研究。

## 二、 中华民族认同和民族群体心态研究

中华民族认同和民族群体心态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些学者将其与国家战略相联系进行研究, 如崔海亮以“一带一路”为背景研究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 认为“一带一路”沿线涉及许多居于中国的跨境民族, 需要加强这些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 促进他们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 以此为纽带将中国各民族连成一体, 共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对改善与周边各国关系、保障“一带一路”实施、打破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都将会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sup>[10]</sup>李庚伦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推动边疆经济发展和经济分配、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协调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战略等行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同时也给中国边疆治理带来新挑战。<sup>[11]</sup>必须推动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主动解决非传统边疆安全问题, 对外大力宣传中华民族文化, 提升边疆形态多样化意识。

李智环、陈旭研究了傣傣族的国家认同历程及其建构, 认为其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段历程, 即漫长的“懵懂”状态、国家意识的“凸现”、逐渐清晰直至明确和巩固的阶段。而目前, 傣傣族的国家认同状况, 从总体上说处于良性发展的局面, 但不能否认现实层面多种因素的存在也令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甚至弱化。因而需从多方面入手, 进一步加强跨境民族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真正将这一群体统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sup>[12]</sup>

赵世林对民族的内聚力和互聚力进行研究, 他认为中国民族的凝聚力因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格局的缘故产生不同层次。第一种是“民族互聚力”, 它由促使各族成为一体的高层次认同形成。第二种是“民族内聚力”, 是由各民族根据自身文化特点和认同意识来源根基形成。这两种凝聚力虽然各自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机制背景, 但共存于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中, 所以应加强研究并正确引导、加强各民族的互聚意识, 完善民族内聚力向互聚力迁移的社会机制。<sup>[13]</sup>

曹海峰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 民族认同不止于关乎自身成员对本族历史、文化的回溯、发掘与重构, 也触及各“民族—国家”间的政治、文化的冲突与博弈。面对由于文化霸权和强势文化渗透造成的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打击与断裂, 不应仅是“回顾”与“模仿”, 更应该进行“创新”与“重构”。必须认真反思“认同危机”与“文化空场”问题,



从战略高度上采取种种措施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创新”发展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再次“建构”民族文化身份。<sup>[14]</sup>

邹丽娟认为居住在云南的多种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受民族迁徙、政治适应、地理环境、贸易往来、文化交往等影响，形成了今天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圆融性特点，它主要表现为宗教文化、习俗文化、政治文化、艺术表现和生态伦理思想等方面的多元一体和互动融合。这一特征是云南打造“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文化心理基础。<sup>[15]</sup>

杨鹏飞的研究聚焦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他认为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强化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实质内核，强调了作为共同体意义上内部各族与国家整体关系的定位。<sup>[16]</sup>他认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就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就性质而言，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不但是民族认同，还是国家认同和共同体认同。这一建构行动是整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逻辑前提，是协调各民族利益的重要机制，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着手点，也是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现代生活的重要精神力量。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有四个基本建构路径：即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共同推进。

### 三、政策文件和会议精神研究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对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文件和会议精神进行解读的研究就迅速展开，这些研究从各方面对中央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会议文件进行解读。代表性成果如下。

何文钜认为想要建设牢固可靠的民族团结根基，除了需要足够的物质支持，更需要精神方面的支撑，尤其需要建构强劲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sup>[17]</sup>中央各类会议中推进民族工作的论述，详细阐述了在新阶段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意义，要将构筑各族共有精神家园视同为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战略任务。统一战线的发展始终与中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应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找准统一战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定位，不断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

赵刚、王丽丽的研究中心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治属性上，他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文化共同体，又是政治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表现为对国家的认同、对族际关系的认同和对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认同。在当前民族主义浪潮和我国民族问题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有必要强化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sup>[18]</sup>

黄易宇通过研究习近平同志关于做好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的讲话精神，认为港澳台同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要把港澳问题放在国际斗争的环境和中国改革开放、中华民族振兴以及祖国完全统一的大势来看待和处理。<sup>[19]</sup>争取海内外同胞的民心，要在台湾建立认同一个中国架构的价值观；在港澳促进国家、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汇聚华人华侨力量，推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和平统一大业。要以大团结大联合为宗旨，坚持原则底线，为实现中国梦团结海内外的中华儿女。

夏妍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与引领作用，认为中华民族精神，集中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及共同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之一。它是